

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

——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

胡裕树 等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

——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

胡裕树 等著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方光焘与中国语言学：方光焘先生纪念文集/胡裕树等著.

- 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

ISBN 7-5619-1113-0

I. 方…

II. 胡…

III. ①方光焘-纪念文集 ②语言学-文集

IV. 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45535 号

责任印制：汪学发

出版发行：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社 址：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http://www.blcup.com>

印 刷：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 数：280 千字 印数：1-2000 册

书 号：ISBN 7-5619-1113-0/H·02092

定 价：24.00 元

发行部电话：010-82303651 82303591

传真：010-82303081

E-mail: fxb@blcu.edu.cn

前 言

方光焘 (1898.8.21~1964.7.27), 字曙先, 浙江衢县人。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文艺学家、教育家, 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术委员, 第三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邀委员。

方光焘先生 1918 年留学日本, 1924 年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9 年留学法国, 在里昂大学专攻语言学。1921 年参加“创造社”, 1931 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先后在上海大学、上海学艺大学、上海立达大学、上海劳动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高等学校任讲师、教授、系主任, 1948 年 1 月起任教于中央大学。解放后, 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 方先生先后担任中文系教授、系主任、语言教研室主任、语法理论研究室主任。方先生还担任过江苏省文化局局长、江苏省文联主席等多种社会职务。

方光焘先生的语言学著作, 主要有: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语法论稿》,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 商务印书馆, 1997 年。

其中《语法论稿》荣获 1992 年第二届吴玉章奖金一等奖。

1984 年春天, 南京大学召开方光焘先生逝世 20 周年学术研讨会, 会上成立方光焘学术思想研究中心。1999 年春天, 南京大学举办方光焘 100 周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我们的这本论文集是在后一次会议的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作者都是方光焘先生的学生。

方光焘先生的学术贡献, 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方光焘先生是属于中国学术界的。方光焘先生的名字将永存于中国学术史。研究和继承方光焘先生的学术遗产, 是中国学术界的事情。评价方

光焘先生的学术贡献，不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能承担的任务。我们编辑这本论文集，表示我们对先生的感激之情，希望能够以此促进中国学术界对方光焘先生学术遗产的研究和继承。我们相信，这种研究和继承对于开创 21 世纪的中国语言学是很有必要的。

王希杰 赵 诚

2002 年 7 月

目 录

缅怀先生业绩, 学习先生做人 (代序)	胡裕树 (1)
方光焘先生和现代语言学	王希杰 (6)
方光焘与中国现代语言学	徐思益 (22)
方光焘与我国理论语言学	边兴昌 (39)
方光焘先生与汉语语法学	王希杰 (55)
方光焘先生对汉语语法研究的贡献	方文惠 (67)
方光焘: 理论语言学大师	卞觉非 (82)
业师的回忆	徐思益 (92)
怀念恩师方光焘先生	冯 凭 (95)
是猛士, 也是严师	陆学海 (98)
关于语言体系的几个问题	胡裕树 卞觉非 陆学海 (101)
语言记号性问题	赵 诚 (119)
深化对语言的认识, 促进语言科学的发展	王希杰 (132)
关于语言本质问题的一些思考	曹剑芬 (145)
汉语语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胡裕树 (158)
灵活性和原则性	徐思益 (174)
动词的“向”札记	吴为章 (186)
论汉语词类划分的一些问题	冯 凭 (204)
副词能否修饰体词刍议	方 华 (213)
论显句和潜句	王希杰 (224)
句子的分析与理解及其相关问题	卞觉非 (240)
关于一种主谓句的定名问题	陆学海 (257)

甲骨文研究史中焦点之一探索	赵 诚 (272)
论联绵字	许惟贤 (280)
上古谐声和音系	赵 诚 (297)
训诂学回顾与展望	赵 诚 (311)
从出土古马车看考古与训诂的关系	滕志贤 (329)
大型汉语词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徐实曾 (340)
《马氏文通》代字章第二人称代词札记.....	夏锡骏 (359)
语法修辞结合的面面观	徐思益 (366)
方光焘主要著作目录	方 华 (373)

缅怀先生业绩，学习先生做人（代序）

胡裕树

一

今年是敬爱的老师方光焘先生诞生 100 周年，也是尊敬的师辈先贤黄淬泊先生 100 周年诞辰。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方光焘先生、黄淬泊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暨学术研讨会”，作为方先生的学生，我是万分感激的。我相信，通过这次活动，一方面可以缅怀两位先生的恩德，颂扬他们的业绩；另一方面可以弘扬他们的治学精神，发扬他们的学术传统，以推动我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

二

方光焘先生，字曙先，是一位学术精湛、广有建树、桃李成林、世所崇仰的一代宗师，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小说家和教育家。先生毕生献身教育，春风化雨，为我国语言学界和文艺界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先生一生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师道表率，感人至深。今生我感到幸运的是一直受到恩师的教诲与关怀。还是在四十年代初，那时我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就受业于方老师的门下，后来又当了他的助教。恩师待我亲如家人，关怀备至，在学术上循循善诱，严格要求。后来，先生虽然来到南京大学任教，但是我与先生的联系从未间断。一有机会我就到南京来聆听先生的教诲，或汇报学习心得，或请教疑难问题，先生每次都给我指点迷津，使我获益良多。多年来，我所以能够在语言学上做点教学和研究工作，应该归功于老师的教诲和培养。而今，我也年过八旬，而且重病缠身，不能走出家门一步，以致不

能亲临盛会，相遇故知，实在抱歉之至。我深悔过去对方先生的语言学说得不够，学得不好，有负于他的教诲和期望，说起来真是万分惭愧。

方光焘先生的语言学说博大精深、广有建树，涵盖语言、文学、创作、翻译乃至哲学等领域。在语言学方面，其主要论著均集结于《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之中，许多语言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均可从中找到准确的答案。

学习方光焘先生的语言学说思想，根据我的体会，似乎应该紧扣如下三点：

1. 学习方先生基于现代语言学理论的语言观

方先生的语言观是在接受并改造索绪尔语言学学说的基础上而逐步形成的。他说：“1928年，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日语版刊行。读了以后，对语言体系又有很大的兴趣，决定终生研究语言科学。”为此，他于1929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潜心研究索氏学说，始终坚持理论高度，着重理解索氏学说的真谛，密切结合汉语实际，在理论语言学和语法理论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1931年先生回国后，便在大学里第一个全面系统地、严肃认真地评价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语言学说。正如王力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语言学吸收西方语言学的优点，把一门科学现代化了，使它有了新的发展。”方先生的引进之功，人们是不会忘却的。

方先生在科学地给予索绪尔语言学说高度评价的同时，也指出索氏及后人在诸如语言体系与要素、语言能记与所记、共时与历时、语言与言语等问题理解与解释上的片面、极端和形而上学等偏颇之处，赋以全面而辩证的内涵，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观。

2. 学习方先生重视理论、讲究方法论的科学研究方法

方先生认为：“体系能否成立，以及经得起事实的验证与否，全看所用的方法如何而定。”他主张：“文法学是以形态为对象的，是要从形态中发现含义”，而不是相反。其方法是“凭形态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这是一个合理的程序。方先生根据汉

语的类型特点，创造性地提出广义形态学说。他认为：“词与词的相互关系，词与词的结合也不外是一种广义形态，中国单语本身的形态，既然缺少，自不能不求助于这种广义的形态了。”1956年，先生又发展了广义形态学说，认为“意义部与形态部相结合的结构、构造叫形态”。并认为这种广义形态应该是划分词类的惟一标准。至今关于词类问题的讨论，大致仍在方先生的理论框架内展开。方光焘教授的广义形态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分布理论，但在时间上则比美国的 Z. S. Harris 要早十多年。广义形态学说使我国学者最早从语言类型学上认清了汉语语法的特性。语言的形态是语言普遍的共性，而广义形态则是汉语所具有的特征。这是他对汉语语法学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1962年，先生又根据当时汉语语法研究现状，从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提出了《研究汉语语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论文，他运用大量的语言事实，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有针对性地论证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八大原则，即透过文字分析语言，以结合关系为研究对象，重视普遍联系和相互制约，着眼于语法体系，注意语法的规范和发展，一般的共性和民族语言特点相结合，注意一般、特殊、个别各类现象的相互关系，以及发扬传统、吸收行之有效的等方法。这是他对语法科学特别是汉语语法学作出的又一个重大的贡献。

1963年，方先生还提出了《试论语言的研究方法》论文，这是我国第一篇从哲学高度系统地论述语言研究的方法论和方法的论文，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看到第二篇专门讨论关于语言研究方法论和方法的论文问世。这更加让我们钦佩方先生卓识远见。

3. 学习方先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求实务本的治学精神

方先生在科学实践中一贯主张“在语言观、方法论的指导下，吸收、改造一些结构分析方法，化人之长，为我所用”。他一直反对在语言研究中罗列现象、就事论事的风习。因为它没有对所列现象从理论上作出解释。他认为，严格地说这算不上科学研究，真

正的科学研究，应该站在理论的高度，运用科学方法，考察所研究的语言事实在该语言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该要素与其他要素存有的互相制约关系，以期建立语法体系。例如，在《论“二”和“两”》一文中，方先生认为，“两”代替了“二”的职能主要原因是为了避免“二”和“五”在语音上可能引起的混淆。“两”一闯入了数目字的系统中去，语言的旧体系已遭受到破坏，失去了平衡。当新平衡还没有完全建立成功的时候，“两”和“二”的用法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方光焘先生的学说活动也充分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の求实学风。比如，汉语语法的下位区分，词类划分中的形态，跨类；具体词类方面的名词独立（无系词）做谓语，形容词内部的分类，副词的性质，代词的性质和范围；句子分析方面的层次划分，主宾语，被动句与性状句，主谓短语作谓语，倒装，无主句，位置、时间词等等一系列的具体研究成果，无一不是从语言实际出发，比较分析各种处理上的利弊，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了问题解决方法 and 思路。

三

敬爱的方光焘老师离我们而去已经三十多年了，然而先生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生死乃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生则生矣，死则升矣！生者所能考虑的是，自己在有生之年做了什么，能够留给后人的又有哪些？值得自豪的是，老师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份丰厚的语言学遗产，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先生生于上一个世纪之交，生活在国家危亡、民族有难的年代。他一生的命运总是跟国家和民族的存亡紧紧相连，同人民大众同患难、共呼吸。早在1921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就加入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1931年他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他又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积极支持民族抗日和学生民主运动，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积极参

与社会变革的社会活动家。他为人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待人以诚、扶掖后学。先生留给我们的人格力量，深深激励着我们前进，我们从先生身上学到了如何做人、行事、立业的原则。先生的一生也是事业上无尽追求的一生。他始终站在语言学科的最前沿，思考着影响我国语言学发展的理论、方法和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真知灼见。

先生的伟绩永照后人，先生的精神永存人间，先生不朽！

在纪念方光焘老师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纪念敬爱的师母华士英女士，是她无私地支持了方先生的事业，是她给予我们慈母般的爱，师母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胡裕树，复旦大学教授）

方光焘先生和现代语言学

王希杰

(一)

提起现代语言学，人们就会想到布龙菲尔德、雅可布逊、叶尔姆斯列夫、哈里斯、乔姆斯基、赵元任、派克、弗斯、兰姆，等等。二十年前逝世的我国杰出的语言学家方光焘先生的名字，也是应当列入现代语言学家之中的。方光焘先生是一位有一定贡献的现代语言学家。

现代语言学的公认奠基人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1857——1913年)，现代语言学的各个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索绪尔的名著《一般语言学教程》的影响。方光焘先生，于1929年到法国里昂大学攻读语言学，主要学习的就是索绪尔的语言学说。1931年回国后，三十多年间，一直在高等学校讲授一般语言学。是我国最早在高校开设“语言学”课程的学者之一。他讲授语言学课程，主要以索绪尔的《一般语言学教程》为基础，他曾经翻译过索绪尔《一般语言学教程》的许多章节，可惜的是未能全译并及时出版。他是我国最早系统地、全面地介绍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学者之一。在三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在五十、六十年代语言和言语的讨论中，他的论文都坚持了索绪尔语言学说中的主要原则。对于索绪尔的语言学说，他是有所继承，有所批判，有所发展的。

作为现代语言学家的方光焘，他区别于语文学家、传统语言学家的地方在于：

坚持语言和言语的区分。

坚持历时语言学和共时语言学的区分，而且更重视共时描写。

明确区分语言和文字，口语和书面语，他重视口语研究，主张语言研究应当摆脱文字的干扰。

重视语言的体系性。

重视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即结构的研究，反对以意义为出发点来研究语法。

妥善的处理好语言的普遍性和民族特征之间的关系。

妥善的处理好语言描写和语言规范之间的关系。

自觉地把辩证法运用于语言研究。

方光焘和欧美的现代语言学家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又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他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他继承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他面对着汉语的语言事实，他要回答中国社会向语言学家提出的问题，因此他成了一位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家。

(二)

最早主张区分语言和言语的是索绪尔，这是他对现代语言学作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语言和言语的区分已经成了现代语言学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也是语言学现代化、精密化、公式化的重要前提之一。

早在文法革新讨论的时候，方先生就运用区分语言和言语的学说于汉语法研究的实践了：

语言学家告诉我们：“语”是言语（language）的单位，隶属于言语的世界的。“句”是“言”（speech）的单位，隶属于“言”的世界的。（《体系与方法》1939。见《中国文法革新论丛》50页）

在回答之前，我觉得应该把“言语”与“言”的区别，略说一说。“言语”是社会的产物；“言”是个人的行为。说得简单一点，language 是言语材料，speech 是言语行动，研究单语形态，研究单语与单语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单语与单语的结合，那都无非是言语材料的研究。一旦用这些材料构成

了句子，那就是个人的言语行动。个人的言语行动，发于个人的思想。（《再谈体系与方法》1939，同上书 63 页）

这里的“言语”即现在通行的术语“语言”，即 Language，即索绪尔的 Langue；这里的“言”即现在通行的术语“言”，即 speech，即索绪尔的 parole。“语言学家”指的是索绪尔。

值得注意的，搞具体语言研究的人，往往不重视理论语言学，而搞语言理论的人，又往往不重视具体语言的研究。因此，一般理论语言学的理论原则往往同具体语言研究脱节。方先生看到了一般语言学原则对具体语言研究的指导作用。在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焘引进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这样就明确了语法研究的真正对象：

东华先生问我：文法的对象到底应该是“语”或是“言”，我的回答是：文法的对象是“言语”（language）同时是“言”（speech）。以“言语”为对象的部门叫作 morphologie（形态论），以“言”为对象的部门，叫作 satzlehre（句子论）。（《再论体系与方法》1939，同上书 63 页）

不是空谈语言学理论，而是把语言理论的一般原则同具体语言研究结合起来，这在当时和今天看来都是宝贵的。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方光焘发起并同高名凯教授一同组织、主持了语言和言语问题的学术讨论。他们两位是这次学术讨论中的主帅，虽然他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但是他们有不少共同见解，如他们都坚持语言和言语的区分，都是以索绪尔为出发点而又不完全同意索绪尔，他们区分语言和言语和言语的目的都是为了明确语言学的真正对象，为了促进语言科学的现代化。

如果说三十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方光焘主要是介绍索绪尔区分语言和言语的观点，用以指导汉语语法研究，那么在六十年代语言和言语的讨论中，方光焘批判地接受索绪尔的语言和言语的学说，发展、深化了这一学说，形成了他自己的更为科学的语

言和言语的学说，并把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贯穿到语音、语义、词汇、语法等领域之中，特别是语义问题，他说：

因此，同是词义，我们可以分别地从语言和言语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从语言方面来看，作为语言单位的、孤立的词的词义，是客观事物、现象、或关系在意识中的一定反映，它是和概念相联系着的。而从言语方面来看，作为言语单位的、运用中的词的词义，则和现实中某一事物或现象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前者正是后者的概括，后者则是前者的体现，这二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漫谈语言和言语问题》1962，《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集》212页）

精辟地阐明语言的词义和言语的词义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是运用辩证法解决语言学问题的范例，也是运用语言和言语的学说研究具体语言问题的范例。

在这次讨论中，方光焘进一步明确了语言学的真正对象，他指出：

我们不能把非语言的，不属于言语的思想体系、立场、观点和言语混淆起来，更不能把它们当作我们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一切科学都要借助于语言、言语来表达一定的内容，各门科学的内容、“总的倾向”是不同的，但它们的表现形式却是相同的。我们语言学所关心的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我们一定要把范围划分清楚。（《语言与言语问题答客问》1962，《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集》324页）

可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不是思想内容。（同上，331页）

如果说，索绪尔在他的《一般语言学教程》的结束处说：“语言学的惟一的、真正的对象是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高名凯中译本《普通语言学教程》323页）这是对现代语言学的一大贡献，那么，在语言和言语的讨论中，方光焘一系列的论述则比索绪尔更进了一步，更加明确，更为精辟，直到今天依然閃

烁着理论光辉，并有着现实意义。

方光焘认为，区分语言与言语，“是二十世纪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中极为重要的中心问题”。它“不仅是理论问题”，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助于认清语言学所研究的真正的对象——语言，有助于理解斯大林指出的语言和上层建筑的根本区别。有助于理解语言和言语的相互关系和语言存在的客观性。有助于理解作为表达形式的言语和被表达的思想意识内容间的关系。有助于认清风格学的研究对象和风格学是不是语言学的一个部门。（参看《语言与言语问题讨论的现阶段》（1961），《语言和言语问题讨论集》165—166页）

（三）

区分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并且认为共时描写更为重要，这是大多数现代语言学家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也起源于索绪尔。索绪尔说：

于是，语言学在这里遇到了它的第二条分叉路。首先，我们必须对语言和言语有所选择；现在我们又处在两条道路的交叉点上：一条通往历时态，另一条通往共时态。（高名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141页）

共时语言学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

历时语言学，相反地，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彼此间不构成系统。（同上书，143页）

而历时事件总有一种偶然的和特殊的性质，尽管从表面上看有些并不是这样。（同上书，134页）

所以历时事实是个别的；引起系统变动的事件不仅与系统无关，而且是孤立的，彼此不构成系统。（同上书，136页）